导　言

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近代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史研究一直是学界的热点，这股学术热潮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区域农村社会经济史备受推崇和重视，江南和华北又是热点之中的热点；二是专题史研究盛行，例如市场史、生态史等领域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青睐。但是应该说近代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史还存在有待开拓或加强的领域，农村金融史就是其中之一。就农业生产而言，劳动力、劳动对象（土地）和资金三者缺一不可。但是以往的研究，国内主要集中在土地制度、租佃关系、赋役制度等方面；海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小农经济的探讨上，即使是在海内外产生重大影响的珀金斯、施坚雅、马若孟、黄宗智等人的研究，对劳动力和资金也缺乏足够的关注。近代中国农村问题异常复杂，即使是一个细小和微观的枝节问题，都有可能牵涉出一个宏大的问题；即使是一个非常短期的问题，也极有可能需要正本清源，进行长时段的考察。本书通过研究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华中地区的农村金融，从而从一个侧面反映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的实况，展现近代中国农村经济的困境，探讨其出路，这就是本书的主旨之所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一、选题动机与研究现状

（一）选题动机

有人说20世纪30年代前期印刷厂的排字工人一见到“农村”二字，接着就找“破产”字码，此话虽有夸张嫌疑，但是由此不难想见当时农村经济形势严峻到了什么程度。的确，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至30年代前期，中国农村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尤其是1932至1935年经济危机最为严重的时期，农村更是一片凄凉和绝望的景象：

自然灾荒频仍而猛烈。1928年陕西、甘肃、绥远、山西、河南、山东、河北、察哈尔8省大旱灾，535县受灾，灾民3000万人。1929年河北水灾，陕西旱灾。1931年江淮运河流域大水灾，灾区16省，灾民5000万，损失财产20亿元。1932年11省330余县水灾，6省130余县旱灾。1933年华北大水，灾区15省252县。1934年旱灾16省369县，水灾14省283县。1935年水旱灾并行，水灾8省241县，旱灾面积7700万亩。1928—1933年水灾旱灾损失约100亿元，平均每家农户损失150元上下。[①] 1928—1932年，仅陕西、甘肃、山西、四川、山东5省因旱灾而饿死者就高达1470万人。[②]

农民大量离村，流离失所。据1933年调查，全家离村之农户占报告各县总农户平均达4.8%，共1920746户；有青年

①薛暮桥：《旧中国的农业经济》，农业出版社1980年版，第94、95页。参见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10—615、717—724页。

②陆定一：《两个政权两个收成》，《斗争》第72期，1934年9月。

男女离村之农家占报告各县总农户平均达 8.9%，共 3525349 户，① 两者合计达 5446095 户，按户均 2 人离村计算，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民离村人口至少在 1000 万人以上。如果农民离村后是从事正当的，或者是从事比业农收入更高的职业，那反倒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问题是农民离村后，大多沦为流民、兵匪、苦力，最好的也只是到人口稀少的地区垦荒业农而已。

农业生产下降。由于 1936 年农业大丰收，所以一般认为是年农业总产值达到了近代最高水平，但就是该年农产收成与十足产量年份相比，仍然有相当大的差距：籼粳稻为 71%，小麦为 64%，小米为 65%，高粱为 71%，玉米为 62%，大豆为 61%，花生为 63%，甘薯为 60%，芝麻为 60%，烟叶为 63%，棉花为 65%，大麦为 65%，燕麦为 63%。②

洋粮大量进口。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存在粮食进口，并且总体上呈现增长趋势，但是从未达到 20 世纪 30 年代前期的水平。1930 年大米、小麦、面粉分别进口 19891103 担、2762240 担、5188174 担，1931 年进口 10740810 担、22773424 担、4889275 担，1932 进口 21386444 担、15084723 担、6636658 担，1933 年进口 20053301 担、17716289 担、3236021 担，③ 农业中国似乎不能为中国人提供足够的粮食了。④ 如果说这些数字还看不出问题的严重性，那么进口粮食在入超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则

①《离村农家数及其占报告各县总农户之百分比》，《农情报告》第 4 卷第 7 期，1936 年 7 月。

②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第 614 页。

③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第 412 页。

④当然这里有资本主义国家粮食倾销造成的影响。

就显得非常惊人了：1930—1932 年粮食进口值分别占同时期入超总值的40.2%、34.9%和 35.5%。一个农业国家入超总额中，粮食进口值竟然占三分之一以上，[①] 足以说明农业凋敝到了何等程度。

农产品出口量减价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迅速扩大。1929—1935年中国五谷及其产品类、豆及豆产品类、植物油类、茶叶类、烟草类、麻类、棉花类、丝类等农产品输出总指数分别为 109.91、101.61、62.99、46.03、42.90 和 52.59，6 年中农产品出口总指数下降幅度达 50% 以上。如果以 1930 年为基期年，则 1931—1934 年上海五谷类、纺织原料类、豆及籽仁类、畜产类、茶叶类、烟酒类等农产趸售物价指数分别为 100.30、86.67、77.14 和 71.87，[②] 5 年中下降最大幅度约达 30%，农家收入所受影响可想而知。

农户入不敷出，负债累累。据 1934 年对全国 163 县 1745357 农户调查，收支有余者 23.21%，收支相等者41.06%，收支不敷者 31.89%。[③] 但据局部调查，农户收支不敷比例还要高于此数。例如据 1929 年对浙江 8 县调查，收支有余者 14.10%，收支相等者26.41%，收支不敷者 59.49%。既然收支不能平衡，剩下的唯有走借贷一途了。据 1933 年调查，全国平均借钱农户占总农户的 56%，借粮农户占 48%，[④] 农村

①徐畅：《民元至抗战前夕粮食进口问题简议》，《安徽史学》 1995年第 4 期。

②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第 606、615页。

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七)，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6 页。

④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第 749页。

社会各阶层生活普遍恶化。

农村金融枯竭，高利贷猖獗。 20 世纪 30 年代前期农村资金大量外流，白银快速地流向城市，银行资金库存数量剧烈增加。各省市纷纷进行金融封锁，禁止现银出境。各地币制异常紊乱，私票猖獗。农村资金极度匮乏，农户借贷不仅利息高昂，而且告贷无门，高利贷猖獗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农村地权趋向集中，小农纷纷破产。据农村复兴委员会对陕西、河南、江苏、浙江、云南、广西 6 省农村调查，各地普遍呈现自耕农没落、贫农雇农阶层农户上升现象，并且这个调查与《农情报告》结论大体相同。①

…… ……

在以上 30年代前期农村破产的诸多现象中，农户普遍负债、农村金融枯竭、高利贷猖獗、农户告贷无门无疑是当时最为显著和最为时人关注的问题，因为它涉及的层面远比租佃关系等方面来得广泛。那么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金融状况到底如何？ 30 年代前期农村金融枯竭的原因何在？农户是通过何种渠道获得资金通融的？这些借贷渠道的运作方式又是如何？面对农村金融枯竭政府有何作为？效果又是如何？大范围、大规模的借贷对二三十年代小农经济乃至整个中国经济产生了何种影响？中国农村金融的出路何在？二三十年代社会各界对农村金融和农村借贷的描述，是万般焦虑之中挑取的极端事例，还是农村普遍状况的真实反映？他们对于农户借贷渠道尤其是对于高利贷的评判是无奈之中的

①参见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第 728—730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愤激之词，还是学理层面理应如此？……带着对如此等等众多问题的疑问，在获得导师张宪文先生的同意后，笔者决定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华中地区农村金融研究》作为博士论文选题。

（二）研究现状

任何学术研究都必须在总结前人成就的基础上才能够进行，因此对学术史进行回顾，不仅是学术道德的基本要求，而且还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前提。下面就笔者所掌握的情况，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金融研究进行简要的评述。

1. 关于农村金融总体状况

20世纪30年代王志莘、吴敬敷著有《农业金融经营论》①，该书从农业金融的需求与供给、农业金融机关、农业金融利率、农家负债之整理、政府与农业金融等方面进行了论述，但是该书基本上为理论著作，偏重学理叙述，对中国农村金融的实际情形极少论及。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编辑了《中国农业金融概要》②，该书在叙述了中国农业金融的概况（包括农户负债、借贷方式、借贷利率、还贷状况等内容）之后，对各种农业金融机关（包括典当、合会、商业银行、农业银行）做了介绍，并就如何改进中国农业金融提出了建议。《中国农业金融概要》与《农业金融经营论》不同，它是一本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著作，这两本书可以看作是20世纪上半期关于中国农村金融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此外，汪洪法、陈振华、林和成、

① ② 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吴敬敷和徐渊若、朱若溪、侯厚培和侯厚吉、伍玉璋、欧阳平与张履鸾、侯哲葊、汪雨平、欧阳平、王世颖、李扬谦、黄通、乔启明、姚公振、郑林庄等先生，[①] 或者就民国时期农业金融的整体状况，或者就农业金融的某一个方面，都有专著刊布。此外，民国时期出版的有关中国经济，尤其是农村经济方面的著作，对农村金融一般也有所阐述。但是总体看来，民国时期学人有关农村金融的研究存在理论与实际脱节、内容大同小异、缺乏系统性、偏重线性描述、少有立体分析、内容单薄等缺陷。

1949 年以后有关近代中国农村金融的宏观研究较少。以笔者所见，以农村金融为题的著作有詹玉荣的《中国农村金融史》[②] 和徐唐龄的《中国农村金融史略》[③]。这两本著作都是从古代写到民国，概略性地叙述了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的

①汪洪法：《农业金融体系的研究》，广东省银行经济研究室 1932 年印行 陈振华：《农业信用》，商务印书馆 1933 年版；林和成：《中国农业金融概要》、《中国农业金融》，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版；吴敬敷、徐渊若：《农业金融制度论》，商务印书馆 1935 年版；朱若溪：《农业金融流通之设施》，正中书局 1933 年版；侯厚培、侯厚吉：《农业金融论》，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版；伍玉璋：《中国农业金融机关论》、《中国农业金融制度及实施论》，均为北碚农村银行 1936 年印行；欧阳平、张履鸾：《农村金融与合作》，中华书局 1939 年版；侯哲葊：《农业金融纲要》，黎明书局 1940 年版；汪雨平：《东北农村金融的分析》，东北问题研究社 1940 年版；欧阳平：《四川农业金融》，中国农民银行四川省农村经济调查委员会 1941 年版；王世颖：《农业金融简论》，金华国民出版社 1941 年版；李扬谦：《农业金融》，金陵大学农经系 1943 年版；黄通：《土地金融问题》，商务印书馆 1943 年版；乔启明：《农业金融》，重庆中央训练委员会 1943 年版 姚公振：《中国战后农业金融政策》、《中国农业金融史》，分别为重庆中华书局和中国文化服务社 1944、1947 年版；郑林庄：《战后中国农业金融》，西南印书局 1945 年版。

②北京农业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③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6 年版。

农村借贷情况。除了分析评判存在欠缺和有待改进之处外，这两部著作因为篇幅较小，时限太长，所以不可能对每一个时期的农村金融进行深入的探讨。解放后宏观上阐述近代中国农村金融的论文也较少，以笔者所见，主要有于治民的《十年内战期间中国农村金融状况》①、宫玉松的《三十年代农村金融危机述论》②、李金铮的《民国时期现代农村金融的运作方式——兼与传统高利贷比较》和《绩效与不足：民国时期现代农业金融与农村社会之关系》③、于永的《20世纪30年代农村金融救济活动的启示》和《20世纪30年代农村金融救济"量"的考察》等。④ 当然，如同民国时期学界一样，解放后学者们探讨近代中国经济史的著作和论文对农村金融也时有论及。例如朱玉湘教授的《中国近代农民问题与农村社会》⑤，就专辟"近代中国的农村金融"一章进行探讨。魏宏运教授主编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太行山区的社会变迁》也辟有"农村金融"章节。⑥ 此外有的文章虽然标题没有冠以"农村金融"字样，但其探讨的实际上就是农村金融内容。⑦

特别值得注意和欣喜的是，近几年来，有关民国时期的农村金融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主要是李金铮教授先后出版了

①《民国档案》 1992年第2期。

②《中国经济史研究》 1995年第4期。

③分别刊载于《江海学刊》 2002年第3期和《中国农史》 2003年第1期。

④分别刊载于《内蒙古师大学报》 2001年第1期和2002年第1期 。

⑤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

⑥ 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⑦ 例如单强：《民国时期江南农村信贷市场之特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借贷关系与乡村变动——民国时期华北乡村借贷之研究》①和《民国乡村借贷关系研究》②。《借贷关系与乡村变动》对华北乡村借贷的基本状况、高利贷、钱会、借贷关系的转型与困难（以合作社为中心）以及中共对传统借贷体系的革命等方面，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民国乡村借贷关系研究》在基本保持了前书研究框架的基础上，将高利贷分为私人、店铺和典当两大部分，进行分别论述，并且对各类新式借贷机构进行了综合研究。由于借贷是农村金融的核心，所以我们说李金铮的成果促进了近代中国农村金融研究。李金铮认为，学界“对（农村）诸种借贷形式的运作方式还缺乏精细的研究，对其社会经济功能也未做冷静的评判。至于区域性的微观研究，更为少见”。所以如其对高利贷等传统借贷方式进行谴责，“还不如深人揭示这些现象的内在结构、运作机制及其与农民的关系”③。在笔者看来，李金铮研究的主要贡献有三点：一是他基本上建立起了一个农民借贷渠道的立体网络；二是他用非常清晰的逻辑线索，对农户的每种借贷渠道进行了梳理和描述；三是他对农户借贷渠道的运作方式进行了非常精细的研究，比如在对高利贷进行研究时，他就对前人忽视的信用方式问题、中保人问题、讨债与还债问题进行了细致的探讨。在笔者看来，李金铮研究的主要缺憾在于，他对农户各种借贷方式的社会经济功能评判，似乎尚未达到他对这些借贷方式本身描述的高度。④

①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②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

③李金铮：《民国乡村借贷关系研究》，第 1、11 页。

④李金铮先生对于各种借贷方式的描述及其社会经济功能的评价，因为内容太多，所以笔者在正文中叙述，在学术史回顾中一般不再涉及。

2. 关于农户融资渠道

大体而言，近代中国农户融资渠道除了出售农产、经营副业外，主要就是依赖借贷。农村放贷主体可以分为传统借贷组织和现代农业金融组织两种方式，传统农村借贷组织主要有私人借贷（基本上就是为人诟病的高利贷）、钱庄、典当、商店、合会等；现代农业金融机关主要是农民（业）银行、商业银行以及一些社会团体。下面就民国以来有关这些问题的研究，作简要的评述。

（1）关于高利贷

高利贷包括私人、商店、典当借贷，为了表达的方便，笔者这里将典当分开，留作下文专门叙述。

一般而言，社会焦点问题必然是学界的热点问题。20世纪二三十年代高利贷在中国农村猖獗程度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焉能不引起学者的关注？只要看一看金陵大学农学院农经系历史组编辑的皇皇三巨册的《农业论文索引》① 和解放后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编辑的《中国农业经济文献目录（1900—1981）》②，就可以想见有多少关于高利贷的论文。但是，据笔者所知，民国时期还没有一部专门论述高利贷的著作，只是在相关著作和论文里，学者们对高利贷多有评述。在这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的论著之中，人们对于高利贷的评价可以王寅生和薛暮桥的论文为代表，③ 前者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高利贷的论述为基础，对中国高利贷作了理论

①私立金陵大学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 1933年版。

②农业出版社 1988年版。

③王寅生：《高利贷资本论》，《中国农村》创刊号，1934年10月；薛暮桥：《中国农村中的高利贷》，《中国农村》第2卷第8期，1936年8月。

论述和批判；后者主要从事实出发，描述了中国高利贷的表现形式，并猛烈抨击了高利贷的危害性。

解放后学界对于高利贷的研究较少，相对而言学者们对近代以前中国农村高利贷研究较为充分。例如李文治先生 20 世纪 50 年代写有《清代鸦片战争前的地租、商业资本、高利贷与农民生活》①，对清代早期高利贷进行了探讨。结合地权变化，章有义先生研究了明清时期徽州农村高利贷。② 方行先生对清代前期高利贷与农民生产和生活的关系做了重新评价。③ 傅衣凌先生的《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④ 杨国桢先生的《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⑤ 陈支平先生的《清代福建乡村借贷关系举证分析》等专著和论文对明清时期全国高利贷，⑥ 尤其是对福建农村高利贷进行了深刻的实证研究。叶显恩先生对珠江三角洲和徽州农村近代以前高利贷也进行了研究。⑦ 近年来张忠民先生对前近代高利贷资本与社会再生产进行了研究。⑧ 刘秋根先生系统地研究了汉代以来的城乡高利贷。在笔者看来，关于中国古代高利贷研究最具新意并对研究近代高利贷具有启发意义者

①《经济研究》 1956 年第 5 期。

②章有义：《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③《清代前期农村的高利贷资本问题》，《经济研究》 1984 年第 4 期。

④分别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1987 年版。

⑤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⑥ 载傅衣凌、杨国桢主编：《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厦门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⑦ 《略论明清珠江三角洲的高利贷资本》，《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集刊》，1987 年版。

⑧ 张忠民：《前近代中国社会的商人资本与社会再生产》，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6 年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当数方行、陈支平、张忠民、刘秋根等先生的成果，其最主要的观点是要辩证地看待高利贷对整个社会的作用，而不是全盘否定。

解放后关于近代中国农村高利贷研究很不充分，诚如王天奖先生在《近代河南农村高利贷》一文中所说："'穷人身上两把刀，租子重，利息高，夹在当中吃不消。'建国后40多年来，学者们对这'两把刀'中的前一把——封建租佃关系，研究和论述较为充分，但对后一把——农村高利贷肆虐情况，无论从广度和深度上看，探讨的都很不够，有限的论著亦多大同小异。'① 关于近代中国农村高利贷，几乎任何一本关于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华民国史等方面的著作都有所涉及，但一般又都仅限于叙述高利贷的形式和危害，缺乏全面的分析。相比较而言，虽然有关高利贷的论文较为少见，但是质量较高。检索1949至1999年专论近代中国农村高利贷的论文，主要有王天奖前揭文、詹玉荣和韩德彰的《旧中国农村的高利贷》和郑庆平的《中国近代高利贷资本及其对农民的剥削》等。② 这些论文除了叙述高利贷的形式、特点和危害外，其主要不同之处是：郑文指出近代高利贷债主队伍复杂化，王文指出高利贷对资本家资本原始积累和创造自由劳动力方面，客观上有一定的作用。笔者以为，近几年来关于高利贷研究最具新意的论文当数慈鸿飞、李金铮、温锐的成果，尤其是温锐的文章不仅新见跌

①《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2期。

②分别刊载于《中国农史》1984年第4期，《经济问题探索》1986年第2期。

出，而且非常扎实细致。① 慈文在研究华北农村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时，认为应从供求规律看待农村高利贷；温文认为“对20世纪初期即苏区革命前赣闽边农村民间传统借贷的状况、运作及其与社会经济关系的重新考察表明，当地的农村民间借贷关系不仅具有普遍性，利息也不是学术界长期所认定的那么高，而且它对当地农村社会经济运行与发展具有不可或缺性，其具体的运作则具有很强的市场趋向性。同时，边区民间传统借贷的负面作用也是明显的。民间借贷不是需要不需要的问题，而是政府如何加以规范与调控的问题”。李文认为“高利贷在农民的生产生活中一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由于高利贷的金融调剂作用，农村社会经济才得以运转，农民生命也才得以延续”。此外台湾学者沈松桥先生在探讨经济作物种植对河南农村影响时，提醒人们不应过分夸大高利贷的负面作用。② 珀金斯、马若孟等先生在他们的研究中，也都强调农户借贷（当然主要是高利贷）对农家经济和农民生活的消极影响可能被夸大了。③

①慈鸿飞：《二十世纪前期华北地区的农村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温锐：《民间传统借贷与农村社会经济——以20世纪初期（1900—1930）赣闽边区为例》，《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3期；李金铮：《旧中国高利贷与农家关系新解——以长江中下游乡村为中心》，《浙江学刊》2002年第6期。

②沈松桥：《经济作物与近代河南农村经济（1906—1937）》，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史论文集》，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版。

③（美）德·希·珀金斯著、宋海文等译：《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18、119页；（美）马若孟著、史建云译：《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民发展，1890—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2—277页。

(2 关于典当

典当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在城乡居民日常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唯其如此，学者们对其也多有探讨。民国时期有关典当的著作，主要有杨肇遇的《中国典当业》①、宓公干的《典当论》②、金陵大学农学院农经系的《豫鄂皖赣四省之典当业》③、区季鸾的《广东典当业》④ 等。除此之外，陆国香、徐启文等学者还发表了大量论文，这些论著对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典当的营业状况、内部组织与农民的关系进行了多方位的探讨。客观地说，可能今天学者们相关的研究还不一定能达到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水准，例如关于对民国时期典当研究，《豫鄂皖赣四省之典当业》至今可能仍然是代表最高水平的。当然这也不是说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典当业研究就没有缺陷，例如它存在沉溺于对典当业衰败的悲叹之中，对典当与农民的关系、典当与农村金融的关系研究还不够。

如同对高利贷的研究一样，1949 年以后有关典当的研究，也是对古代典当研究较为充分，而对近代典当研究较为薄弱。以笔者所见，古史典当研究者虽多，但当以韦庆远先生⑤ 和刘秋根先生的研究最为出色。⑥ 关于近代中国典当研究，著作有常梦渠、钱椿涛主编的《近代中国典当业》⑦，但是该书实

① 商务印书馆 1933年版。
② 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版。
③ 编 者 1936年自刊。
④ 国立中山大学经济调查处 1934年版。
⑤ 韦庆远：《明清史辨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年版。
⑥ 刘秋根：《中国典当制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年版。
⑦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6 年版。

际上是由单篇文章尤其是文史资料汇集而成，不仅没有体系，相当零散，而且深度也不够。关于典当论文主要有马冠武①、钱浩和蒋映铁②、马俊亚③、李金铮④ 等先生的成果，以笔者拙见，其中当以马俊亚先生的研究最具新意，他就典当对江南农村社会的作用进行了多方位的探讨。

值得注意的是港台学者和日本学者对典当业研究所取得的成就。香港学者罗炳绵在20世纪70年代发表系列论文，⑤ 探讨清代以来中国的典当，成就斐然。继罗炳绵之后，台湾学者潘敏德出版了《中国近代典当业之研究（1644—1937）》，⑥ 其中关于典当地理分布与人口的关系、典当业与社会的关系都颇具新意。日本学者对中国典当业研究不仅较早，而且水平较高，天野元之助、安部建夫、有本邦造的成就最为显著。⑦

①马冠武：《试论近代时期的广西典当业》，《社会科学家》 1987年第4期。

②钱浩、蒋映铁：《民国时期的浙江典当业》，《浙江学刊》 1997 年第2期。

③马俊亚：《典当业与江南近代农村社会经济关系辨析》，《中国农史》 2002年第4期。

④李金铮：《20世纪20—40 年代典当业的衰落——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2年第4期。

⑤罗炳绵：《近代中国典当业的社会意义及其类别与税捐》，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期，1978年6月；《中国典当业的起源和发展》，《食货》第8卷第7期，1978年10月；《清代以来典当业的管制及其衰落（1644—1937）》，《食货》第7卷第5、6期，1977 年7、8月；《清代银两生息制度与民国后的农民借贷所》，《大陆杂志》第55卷第3期，1977年9月；《近代中国典当业的分布趋势和同业组织》，《食货》第8卷第2、3 期，1978年5、6月。

⑥ 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 1985年版。

⑦ 天野元之助：《支那における典当（当铺）について一支那における农村金融の》，《满铁调查月报》第16卷9号，昭和十一年九月；安部建夫：《清代における典当业の趋势》，《清代史の研究》，东京创文社昭和四十六年版；有本邦造：《支那典当业の经营研究》（上、下），《东亚经济研究》第20卷第1、2号，昭和十一年二、五月。

(3) 关于合会

合会是中国民间的合作组织，其功能之一就是人们金融上的互助。关于合会的研究有较长的历史，并且 1949 年以前研究较多。最早对合会有系统研究的可能是外国传教士。 1778 年在北京的法国传教士著有《中国民俗录》，其中对合会有描述。1880 年劳钵格神父著有《中国集会》一书，书中详细地介绍了合会，文字达 100 页以上，尤其是他对合会的运行方式和精神，赞赏有加。后来曾任驻华大使的西蒙在法国出版的《中国城市》一书中，除用文字介绍合会外，并附有图表 7 种，说明合会的方法。美国传教士明恩溥久居山东，著有《中国人的特性》一书，书中介绍了山东地区的合会。① 合会真正引起中国学者的注意和研究，始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合作思潮传入中国和合作运动在中国的开展，合作运动的鼓吹者们纷纷从中国历史寻求类似合作社性质的组织，于是社仓、义仓、常平仓、合会开始受到学者们的重视。虽然历史记载不详，但是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合会在中国农村仍然十分流行，所以给研究者提供了活的素材。学者兼银行家王志莘曾组织“平民金融调查征文”,搜集了大量材料,报章杂志也不时刊发有关合会的文章，为其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 30 年代合会研究的代表性人物是王宗培和杨西孟，他们的代表性著作分别是《中国之合会》② 和《中国合会之研究》③。《中国之合会》详细地介绍了合会的种类、计算方法、会规等，是一部关于

①朱轶士：《从合会的优点说到农村信用合作》，《农行月刊》第 3 卷第 6 期，1936 年 6 月 15 日。

②中国合作学社 1935 年版。

③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版。

合会的综合性著作。《中国合会之研究》意在对合会进行改良，所以对合会利息按数学原理进行了精密的研究，以求会员负担之公允，并研制了更加合理的运行方案。除此之外，学者们还在有关专著和专题文章中，对合会的方方面面进行了探讨，例如费孝通先生① 和韩德彰先生② 对合会都有精深的研究。

1949年以后大陆学界关于合会研究不仅开展较晚，而且成果也较少。主要有郑家度、王赓唐和张震、乌廷玉、单强、慈鸿飞、朱玉湘、胡大展、雷文平、张介纯、吕利、周苗苗等、麻国庆、姜旭朝等先生的研究。③ 这些研究大体可以分为

①费孝通著、戴可景译：《江村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188—193页。

② 韩德彰：《浙西农村之借贷制度》，《社会科学杂志》第 3卷第 2期，1932年 6月。

③郑家度：《广西金融史稿》，上册，广西民族出版社 1984 年版，第301—305 页；王赓唐、张震：《试析解放前无锡农村的借贷资本》，载茅家琦、李祖法主编：《无锡近代经济发展史论》，企业管理出版社 1988 年版；乌廷玉、张占斌、陈玉峰：《现代中国农村经济的演变》，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 98—101、272、273页；单强：《民国时期江南农村信贷市场之特征》，《中国经济史研究》 1995年第 2期 单强、酋金生：《论近代江南农村的‘合会’》，《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2 年第 4 期；慈鸿飞：《二十世纪前期华北地区的农村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中国社会科学》 1998 年第 1期；朱玉湘：《中国近代农民问题与农村社会》，第 251－258页；胡大展：《台湾民间合会的法律初探》，《福建学刊》 1995 年第 1期；雷文平：《试论台湾“合会”在两岸经贸交往中的作用》，《台湾研究》 1995年第 4期；张介纯：《浙东地区清代的民间金融组织——钱会》，《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3年第 2期；吕利：《中国近代民间合会述略》，载中孝信、郭建主编：《中国法律史研究》，学林出版社 2003 年版；周苗苗、赵凡繁、吴冲锋：《民间金融的独特形式——合会》，《当代经济科学》 2004 年第 5 期；麻国庆：《“会”与中国传统村落社会》，《民俗研究》 1998 年第 2 期；姜旭朝：《中国民间金融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第 54—78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